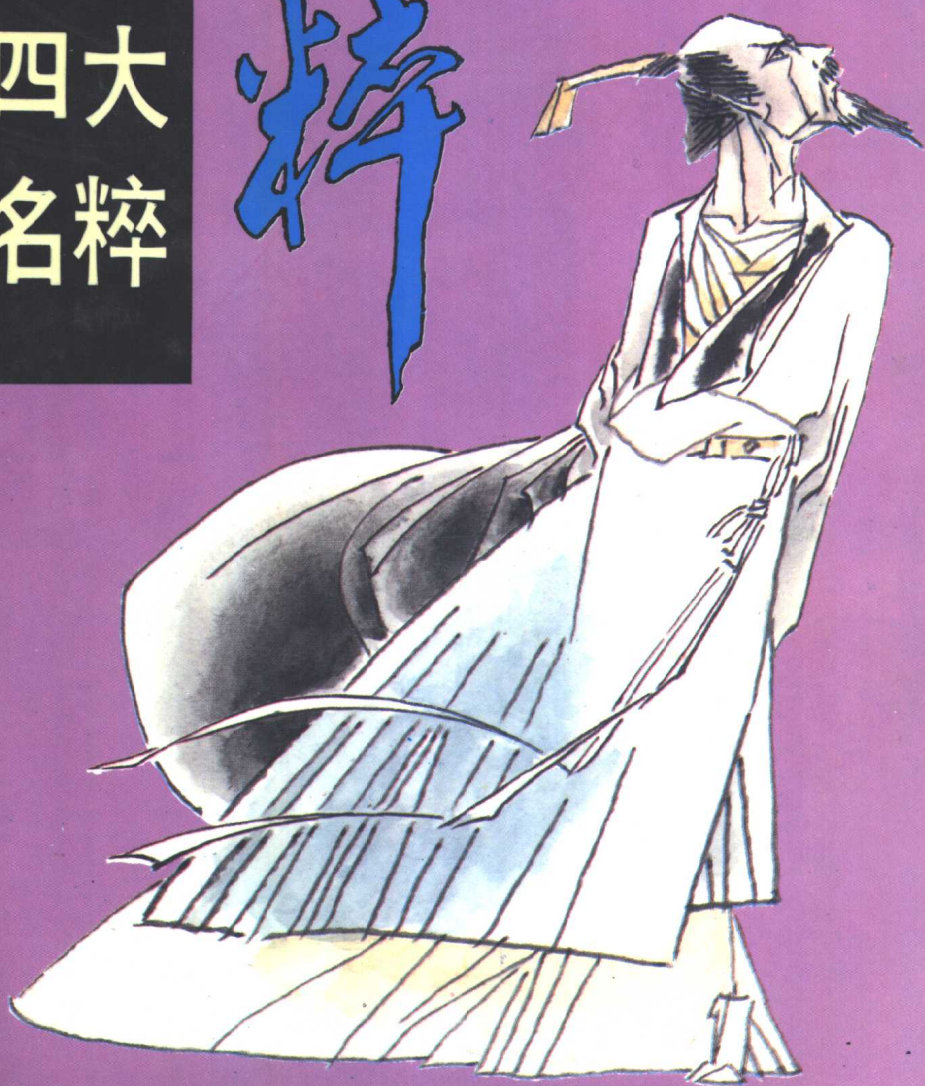


中国
古典
文学
四大
名粹

诗粹



I 213.1
55254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粹

诗粹

上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主 编 王启兴
副主编 张 虹
评 注 王启兴
张 虹
张金海
阮 卫
周茂君

55264

I 213.1
1
12

诗粹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粹

下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主 编 王启兴
副主编 张 虹
评 注 王启兴
张 虹
张金海
阮 卫
周茂君

鄂新登字 05 号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粹

诗 粹

(上·下册)

主 编:王启兴

副主编:张 虹

撰稿人:王启兴 张 虹

张金海 阮 卫

周茂君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 603 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9.875 印张 10 插页 110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54—1068—5

I·876 定价(上·下册):42.00 元

(“四粹”全套 8 册 定价:16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粹”，选收古典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戏曲中的精粹之作。与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比并，堪称辉煌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星云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两大星系。

“四大名粹”中的《诗粹》，收诗、词、曲一千首，《文粹》收散文二百六十篇，《小说粹》收文言、白话短篇小说一百五十篇，《戏曲粹》收杂剧、戏文、传奇十六部。除少数散文篇章系节选外，其他均为全录。

“四大名粹”的编选工作得到了全国各地有关专家、教授和古典文学专业研究人员的全力支持和通力合作。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季思先生亲自参与并指导了《西厢记》注释和评析的编撰。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朔方先生仔细审改了《牡丹亭》、《长生殿》注析的全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郭汉城先生、研究员沈达人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郭豫衡先生于百忙中分别应邀为《戏曲粹》和《文粹》撰写了极有学术价值的前言。在此，谨向以上各位先生以及“四大名粹”选注、翻译和评析的全体编撰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入选作品——经典性

注析文字——学术性

编撰人员——权威性

珍藏价值——永久性

这就是编辑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粹”的追求。

前 言

王启兴

—

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但在文字出现以前的歌谣，只在人民的口头流传。相传尧时的《击壤歌》（见《群书治要·五帝本纪》注），舜时的《卿云歌》（见《尚书大传》）、《南风歌》（见《孔子家语》）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决非尧、舜时代所能产出，毫无疑问是后人所伪托。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是《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本为三百十一篇，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篇为笙诗，有目无辞，所以现存的仅三百零五篇。诗作者和写作年代大都无法确考，但就其全体来看，都是周代的诗歌，最早的作于西周初年，止于春秋中期（前 570 年左右），长达五百多年。《诗经》分为国风、小雅、大雅、颂四个部分，这是从音乐来分类的。这就是说，《诗经》中的诗，最初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后来由于乐曲亡佚，今天流传的只是辞而无曲。从内容看，有

宗庙的祭歌，有朝廷宴飨的乐曲，有叙事性很强的周代“史诗”，有反映战争和徭役的篇章，有揭露贵族丑恶之作，有描述农业生产的农事诗，有婚姻和爱情的歌唱，等等。所以，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历史画卷。从艺术角度考察，《诗经》中那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及“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民歌民谣，语言朴素，描写细致，形象鲜明。同时借助一唱三叹、重章叠句、往复回环的艺术形式，使之情思悠长，极富韵味。一些记实性较强的诗篇，描摹生动，叙事明晰，有一定的感人力量。有些作品则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增强了诗歌的艺术美和感染力，对后世也有巨大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众多的作品，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直面人生和社会的精神与倾向，形成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

春秋中叶以后，兼并战争日益剧烈，所以出现了“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情况。但南方楚国的民间歌谣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更加活跃，更加发展。《楚辞·招魂》云：“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阳荷些。”李善注《文选》，认为“阳荷”当为“阳阿”。而“阳阿”、“涉江”、“采菱”都是楚国的歌曲名。《大招》中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语，“劳商”据王逸注也是楚国歌曲之名。虽然上述歌曲的具体内容现在已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断它们是楚国当时最为流行的民歌。正因为楚地民歌丰富多样，所以才影响上层社会“陈钟按鼓”而“造新歌”，这应该说是战国时期诗歌园地里产生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的肥沃土壤。另外，楚地巫风盛行，正如王逸所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九歌章句》）民间祭祀之时，往往使巫覡“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种巫术文化保留着

丰富的神话故事，它和当时楚国民间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无疑给屈原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另外，中原文化对楚人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点在屈原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他有选择地吸取了儒、道、墨、法等各家思想的有用部分，融合南北文化，构建成了他的独特的艺术世界。

屈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伟大的抒情诗人，他有着高尚的人格，鲜明的政治理想，坚定的信念，以及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怀的爱国主义情感。再加以他是一个有着可贵的独创精神的艺术巨匠，在广阔的诗歌艺术天地中，他以创造性的艺术想象，精妙奇绝的艺术构思，自铸伟辞，把超现实的浪漫遐想和理性精神相熔铸，把恍惚变幻、光怪陆离的艺术形象与充满矛盾的现实相结合，把鲜明的政治倾向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相统一，创作出个性鲜明，独具风神的《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招魂》等杰出的诗章，开创了诗人创作抒情长篇的崭新道路，从而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光照千古诗坛。而以屈原诗作为代表的《楚辞》则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泽被后人，成为《诗经》以后滋润历代诗歌园地的甘霖。

两汉时期，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空前发展，文化也得到了相应的繁荣。但是由于“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周代的三百多篇诗，开始被尊之为经，称为《诗经》，屈原的作品也被认为是“依托五经以立义”的。这样就把诗歌创作限制在儒家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范围之内，诗歌的功能也被规范为人伦教化、美刺讽谕，结果是“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钟嵘《诗品序》）。在诗坛一片沉寂之时，倒是汉初几个政治家的抒情短章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显示了一定的特色。不过这几首诗毕竟不能代表汉代诗歌

的主流,反映汉代诗歌主要成就是乐府民歌。

汉代的民歌,是当时国家音乐机关乐府所采集的,配上乐曲来歌唱,入乐的歌词便称为乐府诗。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由乐府采来的诗歌数量很多,包括的地域也很广,但大多散失而不传,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六七十篇,大部分是东汉时期的作品。虽然如此,但这些诗篇不为儒家诗教所束缚,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较真实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活,传达出社会底层人民的心声。这是那些铺陈排比、堆砌丽词的汉大赋不可企及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汉乐府诗,在运用简洁凝练、口语化的语言叙事和描绘人物方面,比《诗经》细致生动。以人物的对话、活动来展现其内心世界和情绪的变化,也是《诗经》所不及的。《孔雀东南飞》是这方面的代表。这首前所未有的长篇叙事诗,情节曲折,故事性强,人物形象鲜明,极富艺术感染力,它标志着我国叙事诗已臻成熟。从诗歌形式上看,汉乐府诗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以五言、七言、杂言来表情达意,叙事图貌,使诗歌的社会生活容量大大增强。再就题材而论,汉乐府诗中的《东门行》、《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等等,其取材无一不是前所未有的。

反映东汉末年中下层知识分子生活及情感的《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东汉末年随着国势的衰微,定于一尊的儒学已经逐渐失去对人们思想行为的约束力,古诗的作者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主体意识增强,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抒发身处乱世、沉沦不偶的苦闷与哀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朝不虑夕、人生短暂、及时行乐的思绪,真挚而深沉。因为这是古诗的作者对人生中某些最动人、最真切的体验的概括,表现了他们对人生与命运,对生活 and 生命的强烈欲求和留恋,所以

在近乎消沉颓唐的背后，蕴藏着一种现实的能引起广泛共鸣的情愫。在艺术表现上，十九首虽是直抒胸臆的典型抒情诗，但以最简练而富于表现力的笔墨写出，有的含蓄婉转，余韵悠长；有的沉郁悲怆，哀怨感人；有的慷慨激扬，淋漓尽致；有的寓情于景，渲染衬托，凡此种种，都各臻其妙。这些“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古诗镜》）的古诗，又以生动而自然的语言独擅，因而有着“格古调高，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谢榛《四溟诗话》）之誉。可以这样说，“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是建安文学的先声。

在东汉末年动荡的战乱年代，反传统的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彧传》引《魏氏春秋》），网罗了当时四方知名的文人学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王粲、刘桢、应玚、阮禹、陈琳为羽翼的诗人群体，他们不唯开创了诗坛的新局面，同时还孕育了为后世诗人所赞美的“建安风骨”。而建安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诗歌。从流传下来的三百多首诗歌看，就中当以三曹及王粲最为突出。曹操既是建安时代的政治领袖，也是文坛领袖，他“雅爱诗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他现存的二十几首诗全是用乐府旧调和旧题写新内容，大都运用乐府民歌的五言体和杂言体来写，像《薤露行》、《蒿里行》等篇，以挽歌写现实中的重大事件，被后人赞为“汉末实录”。几首四言诗也慷慨悲壮，震烁古今，家传户诵，脍炙人口。曹丕的诗歌形式多样，语言通俗自然，有其特色。他的《燕歌行》两首，句句押韵，是现存最古的文人创作的七言诗。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曹植，其诗作题材较其父兄更为广泛，内容也更丰富深刻。而最能以情动人的是那些“语多慷慨”的篇什，像交织着

哀伤愤懑之情的《赠白马王彪》；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写不幸遭遇和苦闷的《吁嗟篇》、《野田黄雀行》、《七步诗》；执著地追求建功立业的《白马篇》、《杂诗六首》；借游仙以咏怀的《游仙》、《远游篇》、《五游咏》等等。曹植对四言、六言、杂言都进行过尝试，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则是五言诗，他是最早给五言诗奠定坚实基础诗人。

建安诗歌直接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传统，远绍《诗经》、《楚辞》，深刻地反映了建安时代战乱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诗人扫平战乱的豪情，摅写了内心的激愤与不平。这种因“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篇》）而生发为“悲凉之句”、“愀怆之辞”、“忧生之嗟”，以及“建永世之业”的咏叹，形成这一时代诗歌“梗概而多气”的美学特征，也就是后人所称道的“建安风骨”，不仅为后世诗人所仰慕学习，同时也更鲜明地表现出文学自觉的时代风貌。

建安之后，正始时期的重要诗人是嵇康和阮籍。嵇康爱好老庄学说，攻击周孔名教，反对司马氏，终于被杀。诗存五十四首，多为四言，主要表达一种高蹈遗世之思。阮籍是把五言抒情诗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的诗人。他处在魏晋易代之际，既不满曹魏政权的腐朽，又憎恶司马氏的残暴。颜延年说他“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咏怀诗》李善注引）。阮籍诗歌深文隐曲、飘忽迷离、难求归趣的独特的美学风貌，应该说是建安诗歌后五言诗在艺术上的新创造。

西晋五十二年，朝政昏暗。在诗坛上则是“采缵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篇》），“缵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已经没有了建安时代慷慨悲歌的感

人力量,大多追求辞藻华美,内容较为贫乏。这一时期诗人不少,经常被称道的有“三张”(张协、张载、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此外还有张华、傅玄,以及西晋、东晋之间的刘琨、郭璞。其中以陆机、潘岳、张协,特别是左思成就较高,刘琨、郭璞虽然留下的作品不多,但别具神采。

陆机才情富赡,诗中虽有新意象,但过于雕琢,追求词采,轻绮繁富,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赴洛道中二首》,叙写行役,有一定的真实感受,且景中有情,较少繁缚之语。与陆机齐名的潘岳,在注重辞藻华丽方面和陆机并无二致,只是显得明净流畅,内容则平淡少味,只有少数言情之作,为世所重,《悼亡诗》三首,较为突出。张协的诗造语新颖,词采葱蒨,较少繁冗平弱之弊,《杂诗》十首,随感抒写,描绘景物,“巧构形似”,明净清秀。左思是西晋诗坛颇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歌今传十四首,其中《咏史诗》八首,可推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在这一组诗中,诗人借歌咏古人古事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虽为咏史,实为咏怀。诗篇以雄健的笔力,高昂的激情,抨击腐朽的门阀制度,表现了不凡的功业理想和旷远不群的情操,磊落慷慨,感触殊深,是建安风骨的嗣响。刘琨的诗仅三首传世,都充满爱国热情,悲壮激越,深沉感人。郭璞的《游仙诗》为其代表作,诗中虽多歌颂遗世隐逸,但也不乏哀世感时之思,颇近于咏怀,所以钟嵘评其为“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诗品》)。

东晋时期士大夫崇尚玄学,尊奉老庄,影响及于诗坛就是玄言诗的出现。所谓玄言诗,即在诗中大量运用“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中的事义典故,阐扬玄理,使诗篇成为老

庄的注疏。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诗人，完全不顾山河破碎，民族危机深重，悠游山林，习玄清谈，诗作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然而这种恶劣诗风却统治了东晋诗坛，产生不少“寄言上德，托意玄珠”（《宋书·谢灵运传论》）的玄言诗，直到陶渊明登上诗坛，才发生重大变化。

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田园诗的开创者，在我国诗歌史上也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他出身低微，但性情耿介孤傲，曾因家贫而出仕，但又耻为“五斗米折腰”，于是不久即慕自然而归隐。他的田园诗是深切体察了农村自然风光之美而发的，因此诗中描绘的全是农村田家景色，这是诗人和淳朴的农民活动于其中的山川自然，恬静、和谐、优美。无论是墟里村落、鸡犬牛羊、田父近邻，也无论是日光月色、原野田稼、飞鸟林木、和风微雨……都自然而和谐地存在着，都各得其所而生生不息，不言美而美充溢于其间，这就是陶渊明诗歌所独创的田园之美的艺术境界。他以极为简练、看似平常、但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思想，描摹田园风物，形成自然平淡的独特风格。前人评陶诗之长为“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诗品》），“陶诗淡，不是无绳削。而绳削到自然处，故见其淡之妙，不见其削之迹”（王圻《稗史》）。陶渊明的诗歌，对唐代的王维、孟浩然直至晚清的龚自珍、黄遵宪都有不小的影响。

宋、齐时代，诗坛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篇》）。谢灵运是这一时期较早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对山水诗的发展有着开创之功。虽然在他之前殷仲文、谢混都写过山水诗，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南齐书·文学传论》）。谢灵运在东晋文士徜徉于明秀的江南山川中，山水审美意识有着重大

发展的氛围中,更自觉的欣赏自然之美,对名山胜水,肆意遨游,“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蹻”。登临纵览之后,“辄为诗咏,以致其意”(《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的山水诗,表现出“情必极貌以写物”的特点,为后人提供了诸如生动逼真,形象鲜明,词采圆美,语言锤炼等艺术经验。虽然他的山水诗仍有雕琢之迹,玄理的说教,但其推进山水诗发展之功不可没。

刘宋时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人是“才秀人微”的鲍照。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内容现实性强,感情激昂,颇多慷慨之气,与建安风骨相近。最能表现他诗歌创作突出成就的是七言乐府和杂言乐府。这些作品感情喷涌,奔放俊逸,音节抑扬顿挫,笔力雄肆遒劲,有“倾炫心魂”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拟行路难十八首》,不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方面的创造,对唐代的李白、岑参、李颀、高适等诗都有重要影响。

齐代诗坛虽无陶渊明、鲍照那样的诗人,但也出现了新的风气和诗歌“变有唐风”的诗人谢朓。齐代诗坛的新风气就是齐武帝永明年间的声律理论,即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巧妙地利用汉语平上去入四声的不同,注意同声母字和同韵母字的安排,以加强诗歌的节奏感和声律之美,这是诗歌表现艺术的重大发展。当然,在诗歌创作中讲究音韵之美,建安时期的曹植就开始探索了,他注意“以音律调韵”,所以有“八音朗畅”的艺术效果。但问题自觉地提出,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在创作中进行实践则是齐永明间的沈约、王融、谢朓等人。当时人把讲求四声的诗歌称为“永明体”。这种新诗体一出现,立即引起诗人注目,影响所及,下至梁、陈、唐代。

谢朓是永明年间最有成就的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上讲求

音韵铿锵，四声协调，语言自然平易，确有“圆美流转如弹丸”的特色。沈约《伤谢朓》云：“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描绘自然景物，表现清绮秀逸的自然美，是谢朓诗又一突出的特点。《诗品》说谢朓的山水诗“其源出于谢混”，不为无据，不过谢朓更多的是受谢灵运的影响，但又能卓然成家。他摆脱玄言的枯燥说教，在自然风光的描摹中，渗透着主观感情，极富情韵，同时不过多地堆砌词藻，显得清新流丽，被李白赞为“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可见其清秀俊美的山水诗对后人的影响。

除谢朓外，齐、梁之际负盛名的诗人还有沈约、江淹。前者的几首山水诗，不乏佳句；后者则“善于摹拟”前人之作，但也有自己的情感流注其间。梁、陈诗坛，有何逊、吴均、阴铿等诗人，间有山水佳作，在诗歌艺术上也各有创新之处。被杜甫称为“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的庾信，原为梁朝的宫体诗人，四十三岁时奉命出使西魏，被扣留不遣。不久魏军南下灭梁，西魏政权又为宇文氏所代，改国号曰北周，庾信又被强留长安。由于屈仕敌国，加以国破家亡，他的内心是无限凄苦的。这些深沉的感慨，使其诗歌充满了故国和故土之思，羁旅漂泊的情怀，以及“失节”的痛苦心情，沉郁悲凉，有着强烈的感人力量。在诗歌形式方面，除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发展了“永明体”外，他还对七律和七绝进行创作尝试，对唐代近体诗的成熟与发展有一定贡献。

南北朝民歌是汉乐府民歌之后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由于南北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俗有异，具体产生的土壤不同，所以南北民歌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表现的艺术形式，都有显著的差别。南朝民歌主要是《吴声歌曲》和《西曲

歌》两大类，此外还有《西洲曲》、《长干曲》等。南朝民歌多为男女爱情的唱和，既有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又有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抗争，也有商人和歌女之间的和答。在表现形式上突出的特点是五言四句，吴地口语入诗，比喻生动贴切，隐语、双关语新妙得当，风格清新柔媚。北朝民歌流传至今的仅六十余篇，见于《乐府诗集》中的《鼓角横吹曲》。北方民歌题材广泛，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较广，诸如从军生活、对勇猛善战者的歌颂、骑射生活的描绘、赞颂宝刀战马、反映人民疾苦，以及苍莽的大漠风光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辞》，女英雄木兰的光辉形象，光照千古诗坛。北方民歌风格粗犷伉健，贞刚豪迈，与南方民歌迥然不同。

进入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六朝诗坛，为唐代诗人积累了多方面的诗歌创作经验，尤其是对诗歌特质及审美功能的认识与创作实践，更为可贵。正是由于魏晋六朝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拓展和创造，唐代诗人才有可能在这一基础上，树起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丰碑。

二

隋朝国运短促，三十多年即亡，入隋的诗人多为南北朝旧臣，受南朝文风影响较深。只有原是北朝诗人的卢思道、薛道衡等人，写过几首有新鲜气息的诗，如《从军行》、《昔昔盐》、《人日思归》等。隋炀帝杨广早年有“非轻侧之论”，所以早期诗有数篇可读。隋代诗坛是南北朝诗歌向繁荣的唐诗过渡的最初阶段。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极为辉煌的时代，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时期，